

徐渭散文研究

付 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渭散文研究

付 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渭散文研究/付琼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325 - 4882 - 8

I. 徐... II. 付... III. 徐渭(1521~1593)—古典散文—
文学研究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791 号

徐渭散文研究

付 琼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50,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4882 - 8

I · 1992 定价:2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章培恒

付琼博士希望我为他的《徐渭散文研究》写篇序,已有好些时候了;我也承诺过。但这半年来疾病缠身,杂事依然不断,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动笔。现在他的书稿即将付印,已经到了拖不下去的时候了,我却又进了医院。实在无法,只好简单地说几句,聊以见意。

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创意的书,其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对徐渭研究中流行甚广的“徐渭应属于复古主义的反对派,上继唐宋派的余绪,下开公安派的先声”的说法所作的很有说服力的否定。由此必然导致对徐渭乃至从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文学发展的新的思考。

在关于袁宏道与徐渭的关系上,付琼依据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指出袁宏道是万历二十五年才接触到徐渭的作品的,而其时袁宏道的“性灵说”早已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到万历二十七年间,袁宏道的思想就开始转变,其性灵说的具体内含已有了变化,逐渐趋向倒退,创作上也消失了先前的锋芒。如说徐渭的“开公安派的先声”是说徐渭对“性灵说”的形成或袁宏道的创作实践起过什么积极影响,真不知从何说起。

倘说这是指在袁宏道以前徐渭已在其文学主张或诗文创作中体现了与袁宏道的进步文学观与创作特色类似的倾向,那就牵涉到徐渭与“复古主义者”的关系了。

付琮在其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徐渭的《书田生诗文后》(按,“田生”指“田水月”,即徐渭自号),指出其所谓“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的创作道路,与复古主义者——特别是主张以“达岸舍筏”为复古之道的何景明——若合符节。如果这就是“开公安派的先声”,何景明早就开了,何必劳动徐渭再开一次!在这种创作道路中,我们所看到的倒是徐渭与复古主义的一致性。

当然,《书田生诗文后》有一点是与李梦阳不同的。李梦阳反对宋文,徐渭却肯定苏轼之文;但李梦阳的反宋文是反对宋文的理学气(参见拙作《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而徐渭所肯定的却正是为理学家朱熹所反对的苏轼之文,而且正如付琮所已指出的,徐渭在肯定苏轼时还对朱熹大施抨击。所以二人在这点上虽似相异,根底实同;何况徐渭只是在“姑为近格”时才“兼并昌黎、大苏”,本未把他们与其“最契者”庄子、贾谊相提并论。

剩下下来的就是其与“唐宋派”的关系了。“唐宋派”的名称本来就存在问题。因为唐顺之、王慎中其实只是崇宋,尤其是宋代的曾巩,对苏轼却并不满意,徐渭则于宋文中独独推尊苏轼。另一个被认为“唐宋派”的茅坤虽然标举唐宋八家,但非派中首脑人物,唐顺之并公开指出二人的主张之间尚有“小小异同”(《与茅鹿门知县书》二),岂能因茅坤之故而把唐、王一并称为“唐宋派”(此点早就有学者指出)?更岂能因徐渭的赞扬苏轼而把他与唐、王视为同道?而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唐、王,还是茅坤,都把文作为“载道”的工具,茅坤的标举唐宋八大家是把他们作为“载道”的样板来看的;他们的所谓“道”,又显然是儒家之道。至于徐渭,则正如付琮所说,他既对韩愈文中之“道”加以非议,又对苏轼文

中被朱熹所指斥者大加歌颂,这哪里是“继唐宋派的余绪”?

然则徐渭与唐顺之的关系又如何理解,有人不是说他们曾有交往,而且处得不坏么?这就要从人际关系来看了。徐渭受胡宗宪重用,有知遇之感;胡宗宪是严嵩手下的大红人;唐顺之满口道学,实际上却对严嵩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这是只要看看他为严嵩诗集所作的《序》是如何肉麻地吹捧严嵩就可以知道的;严嵩要唐顺之为自己的文集作序,也可见其对唐顺之颇为抬举。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唐顺之与胡宗宪自然要相互拉拢,因而唐顺之不敢得罪胡宗宪所重用的徐渭;徐渭看在胡宗宪的面子上,自然不得不给唐顺之以相应的尊重。徐、唐二人在文学上既非志同道合,他们的关系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了。

所以,我认为付琮在这方面的论述是言之有据的,无论对研究徐渭还是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都很值得重视。同时,即此一端,也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被视为定论或接近定论者需要重新探讨的正多,有些青年研究者认为古代的重要作家作品都已被前辈学者研究得差不多了,自己只能去研究一些尚未被研究过的小作家,实在大可不必。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付琮在《后记》中说,在其入学的第一年,我对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这却是他的误解。其时我正服用一种抗癌药,药物的副作用使我极为暴躁,因此虽不致如“刀斧”手之凶狠,却也常常疾言厉色;但并不是为了加以“改造”。当时被我如此对待过的,除了付琮以外还有别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现在在广州大学任教授的李舜华博士也是其中之一。这都是我应该道歉的。只是现在我又不得不重新服用此种药物了;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

2007年11月7日

前 言

现存的徐渭散文主要收在《徐文长三集》(万历二十八年商维濬刻本,以下简称《三集》)、《徐文长逸稿》(天启三年张岱刻本,以下简称《逸稿》)和《徐文长佚草》(1926年沈德寿排印本,以下简称《佚草》)三种文集中。万历四十二年钟人杰所刻《徐文长文集》虽然由于加入所谓“袁评”和其他原因而成为后来影响最大的本子,却完全由《三集》删选而来,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三集》的选评本。为了与“钟本”争夺读者,商氏在万历四十七年对原《三集》作了一些诸如修改目录、挖去刻工、删掉后四卷的处理,只是改头换面,也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嘉靖四十一年所刊《筹海图编》有署名徐渭作的《龔山之捷》一文,此书卷十《彭应时传》与《徐文长三集》卷25《彭应时小传》大同小异,当亦出自徐渭之手。隆庆三年俞宪编选的《盛明百家诗》所附《徐文学集》收赋5篇,万历四十五年陆元锡(张侯)所辑《一枝堂稿》也有一些散文。《龔山之捷》以及《徐文学集》和《一枝堂稿》中为《三集》、《逸稿》和《佚草》未收的散文后来都由中华书局收入《徐渭集》中。《徐渭集》(1983)除收入《三集》、《逸稿》和《佚草》外,又“另据《盛明百家诗》、《一枝堂稿》等及书画题记补辑了一些佚作,作为《补编》”^①,是迄今为止收徐渭诗文最为完备的集

^① 《徐渭集·出版说明》,见《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引文出此本者,不再重注),第4页。

子。此集收文凡 844 篇,其中《三集》368 篇。据陶望龄《刻徐文长三集序》,《三集》从《文长集》、《阙编》和《樱桃馆集》中选刻的比例是“文取五”,以此推之,当时三个集子的散文总数当在 700 余篇。

由此可见,《徐渭集》所收的徐渭散文已经很全,比陶望龄当时所见到的还要多出 100 余篇。

关于徐渭诗文集的版本情况,梁一成《徐渭的文学与艺术》附录五《著作考》^①所述最为详审,中华书局《徐渭集·出版说明》和徐朔方《徐渭年谱》^②也都作了清晰的梳理;关于徐渭生前自刻文集的活动以及万历后期《徐文长文集》与《徐文长三集》的读者之争及其版本问题,本书《附录二》和《附录三》分别作了交待,这里不再重复。下面将对明清徐渭散文研究的概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明清两代的徐渭散文研究是明代诗文研究史的一个部分,明代诗文研究是在“崇道、讲艺、重情”的消长和组合中发展的^③,与此相应,明清两代的徐渭散文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在三方面消长与组合的过程。大致说来,以万历二十八年《徐文长三集》的出版为标志,徐渭散文研究进入极盛期,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明亡,历时 44 年。徐渭散文的绝大部分在此期得到了整理出版,有关其散文的特色、渊源和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原创性的深入探讨;徐渭文集发行后,市场上出现了“人人竞赏争

① 梁一成《徐渭的文学与艺术》,台湾艺术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237 页。

② 见徐朔方《徐朔方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196 页。

③ 陈正宏《明代诗文研究史》,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取,纸价倍贵”^①的火爆场面,徐渭散文成为众多明文选集的主角,徐渭本人在文坛上的地位空前提高。这都与“崇道”观念失去市场,而“重情”观念成为主流,“讲艺”风气盛行文坛,有某种因果联系。

清代的徐渭散文研究在崇道观念的桎梏下总体上比较萧条。黄宗羲编选的《明文海》、《明文授读》选了不少徐渭散文,可以看作是对晚明徐渭散文选评的一个总结,也可以看作是晚明徐渭散文选评热的一个余波。其余选本,尤其是康熙一朝出现的几个重要明文选本,对徐渭散文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对徐渭诗文的评价也从以赞扬为主转变为以批判为主。其间《明史》徐渭本传和《四库全书总目》对徐渭散文的若干方面做了一些中肯的评价;道光二十六年《青藤书屋文集》作为海山仙馆丛书之一种印行,虽然此集由钟人杰万历四十二年《徐文长文集》三十卷而来,但在徐渭文集长期没有重印的背景下,它的重印对于方便读者的阅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如此,清代的徐渭散文研究无论在资料的整理还是在文本的评价方面都没有大的起色,这在本质上也是崇道观念作为主导思想在徐渭散文研究上的一个表现,因为在漠视情感表现、注重载道功能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徐渭散文的尖锐情感和独具个性的表现方式必然会被认为是狂悖躁戾的,这些曾深受晚明人喜爱的情感品质和表现方式在老成持重的清人眼里已颇为不合时宜了。这一点可以从晚明与康熙两个时代明

① 商维藩《刻徐文长集原本述》,见《徐文长三集》(二十五卷本),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七年商氏修改重印本。关于此本详情,请参附录三《〈徐文长文集〉与〈徐文长三集〉的读者之争及其版本问题》。

文选本对徐渭散文的选入篇数和评价的对比中看出来。现将入选篇数的对比结果列在下面：

成书/刊刻 年代	选集名	编选人	选入 篇数	成书/刊刻 年代	选集名	编选人	选入 篇数
天启三年 (1623)	明文奇赏	陈仁锡	28	康熙六年 (1667)	赖古堂 文选	周亮工	0
崇祯二年 (1629)	明文致	蒋如奇	10	康熙二十 六年 (1687)	明文英 华	顾有孝	0
崇祯三年 (1630)	媚幽阁 文娱初 集	郑元勋	0	康熙三十 二年 (1693)	明文在	薛 熙	0
崇祯六年 (1633)	十六家 小品	陆云龙	71	康熙三十 二年 (1693)	明文海	黄宗羲	39
崇祯七年 (1634)	明文霏	刘士麟	4	康熙三十 八年 (1699)	明文授 读	黄宗羲	5
晚明时期	文章辨 体汇选	贺复征	41	康熙年间	明文远	徐文驹	1

上表所列6部晚明选本共选入徐渭散文154篇；除掉黄宗羲的两种外，其余4部康熙选本只选了1篇。从评点的态度来看，清人与明人也大不相同。《明文奇赏》^①卷26选徐渭散文28篇，有眉批20处，对其“出袖迸霞，入齿飞雪”的“藻”、“雅”

^①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天启三年刻本。

风格,对其一语“胜百千语”,却又能“似欧冶铸剑,神光逼人”的表现艺术,表示了极大的赞赏;蒋如奇《明文致》^①选文的标准单在一个“致”字,他批评“明文之厄”曰:“古人操管率称兴会淋漓,楮墨缘心胸为之,以故掇皮皆真,虽小小点染,妙致可挹。而今人动相祖述,词不由衷,如缀枝之花,了无生韵,读未卒卷,便昏昏欲睡,则惟其致少也。”那么,这个明文所少的“致”是什么呢?他说:“凡忠臣孝子,高隐奇侠,与夫怀春之怨女,失意之才人,无不酣喜颠放,灵性所喷,落腕皆鲜,是则予之所谓致也。”《明文致》仅20卷,像唐顺之这样为通常选家所看重的作家,入选的作品都很少,却选入了徐渭的10篇散文。此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所选徐渭散文的正文皆缺,其评论如何惜未能见,但从选文之多来看,作者显然认为徐渭散文是很符合以“灵性所喷,落腕皆鲜”为特征的“致”的标准的。此书卷三所选王思任《徐文长逸稿叙》有关于徐渭散文的眉批,其中在评徐渭诗歌“英雄气大,未有敢当文长之横者也”句上有“文亦横绝宇宙”六字,在评徐渭散文“又如著短后衣,绁险一路,杀讫而罢”句上有“评当”二字,此文文后有“老藤怪,此文亦怪”的评语。可见,评者所欣赏的“致”还包括横、狠、怪这样的与传统审美习惯格格不入的品质,与《明文奇赏》的偏爱其“藻雅”一格有所不同。陆云龙《翠娱阁评选徐文长先生小品》^②比《明文致》走得更远,它将徐渭散文中牢骚激愤、诋海嘲谑之类为封建道德所不容的情感也全盘加以肯定。陆氏《十六家小品》各家例有小引,其《徐文长小品引》曰:“若寒士一腔牢骚不平之气,恒欲洩之笔端,为

①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崇祯二年咏兰堂刻本。

② 上海图书馆藏崇祯六年崢霄馆刻本。

激为漶,为诋海,为嘲谑,类与世枘凿;且买名无资,吹誉寡党,无心之水乳,可耸主知,可券奕世,偏不能快同时之嗜。”徐渭小品中“为激为漶,为诋海,为嘲谑”的激烈情感虽然“与世枘凿”,也不能“快同时之嗜”,却深为陆氏所喜爱。这一点也可以从其评语的内容看出来,如《叶子肃诗序》眉批称“笑骂妙绝”,文后评称“识超而言爽”,结合眉批可以知道,所谓“言爽”也就是“笑骂”得痛快斩绝。《送沈君叔成序》眉批称“写得张皇,光焰闪烁”,文后评称“壮气悲风,交集笔底”。“从容舒徐”才是传统评家称道的散文风格,而这里却把与此相反的“张皇”风格与“光焰闪烁”一语相提并论,对其赞叹不置。《又启严公》眉批称“英雄悲愤语”,文后评称“伏枥悲鸣,腾跃之气固在”,《祭张太仆文》称其“似长号痛咽而不能出声”,作者所赞赏的都是些哀而且伤、怨而且怒的过激情感。总之,陆云龙把徐渭散文激烈的个人情感放在很高的地位上加以评价,其所选入的散文也多是充满个人意气的个性之作,很能代表晚明评家对徐渭散文的一般看法。

与晚明人相比,清人的崇道意识要强得多。在他们眼里,晚明人对徐渭充满个人意气的散文风格的偏好是很病态的。《十六家小品》四库提要称陆云龙评语“大抵轻佻儇薄,不出当时之习”^①。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他们对徐渭散文就不可能有什么好感。《赖古堂文选》^②选明文 300 余篇,其“凡例”自称选文标

①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715 页。

② 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六年周氏自刻本。

准是非“粹然一归于正”者不收,看来徐渭散文很不符合这一标准,因而也就没有入选资格。此后,无论是仅只10卷的《明文英华》,还是长达100卷的《明文在》,都不选徐渭散文。《明文远》选了徐渭的一篇《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并称赞此文“健笔凌霜,千载下尚有生气”,算是一个例外。此集卷197还选了陶望龄的《徐文长三集序》,按此文文后评的说法,选这一篇的理由是陶氏“于文长无过量之辞”,也就是说,此序之佳在于它不像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一样对徐渭夸饰过甚。徐渭的性格和文章都有两面性,就其性格而言,既有“偏激”也有“温厚”的成分^①,就其文章而言,既有激诡躁戾的一面,也有慷慨正大的一面,明人看重的是前者,而清人肯定的是后者。就是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徐渭的态度也不是没有清人的一般偏见。其《明文海》的选文标准在“崇道”与“重情”之间“存在着具有深刻矛盾的两重性”^②,表现在徐渭散文的选录标准上,就是文献标准与文学标准的交叉。而以文学标准选入的文章之中,情感激烈的散文和情感平和的散文也各占一定的比例。《明文授读》系黄氏晚年作为家用教材而编的,其所选入的徐渭散文学性虽然很强,但这些作品同时又具有情感醇正的特征。这样看来,他对于徐渭散文激诡躁戾的一面所持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样的态度在清代很有典型性。清人对徐渭的书画和部分题画诗评价都不低,对其散文以及其中所表现的狂颠之态、激戾之情就颇

① 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② 陈正宏《明代诗文研究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不喜欢。小徐渭 26 岁的明人李维桢对徐渭批评甚苛,其《徐文长诗选题辞》说袁中郎推扬徐渭是“逐臭嗜痂,不可为训”,是“取古人所不屑道,高自标帜”的“不知量”之举^①。沈德潜则认为因受知胡宗宪而写下“谀文”,是徐渭的不幸^②,这个评价开了《徐文长文集》四库提要“非才之难,处才之难”这一评价的先声。评其人则云“处才之难”,评其文则云“未免瑕颣”,这是清人对徐渭及其散文较为一致的看法。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清人对徐渭散文的主流评价是否定性的,这与晚明对徐渭散文的热烈揄扬形成了鲜明对照。

以上是对明清徐渭散文研究大势的概述,下面将就明清两代关于徐渭散文的分期、特色、渊源和地位四个方面的评价稍作梳理。

(一) 分期 明清人对徐渭散文的分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对于徐渭心态的变化这一分期依据的要素,有不少论述。大致说来,明清人习惯把万历元年徐渭出狱看作其心态的转折点,认为“愤益深,佯狂益甚”的躁动一面是其晚年心态的主流,其依据便是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这与今人以作品为依据,把 46 岁削去秀才学籍看成其心态的转折点,很是不同。陶望龄《徐文长传》说徐渭出狱后“性纵诞”、“深恶诸富贵人”,又说他“中被诟辱,老而病废,名不出于乡党”。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七年所作的《徐文长传》中则说他“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愤

① 李维桢《徐文长诗选题辞》,见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二,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② 沈德潜《归愚文钞》卷十九,见《沈归愚诗文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间教忠堂遞刻本。

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①,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时携钱至酒肆,呼下吏与饮。……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陶袁二传的观点集中在徐渭晚年更加纵诞和倔强一点,就是说他晚年的心态更加躁动,而不是更加平静。只是袁传比陶传走得更远,夸张的成分也更多一些。老实说,袁宏道写此传时,对徐渭生平知之甚少,他所知道的大都是陶望龄的转述,对此他本人有过明确交待,其《答梅客生》云:“徐文长病与人,仆不能知,独知其诗为近代高手。若开府为文长立传,传其病与人,而仆为叙其诗而传之,为当代增色多矣。”^②可见,袁宏道自认为对徐渭“病与人”知之甚少,为其本人作传不太够格。与陶传相比,袁传在徐渭生平的信息方面也着实无多新意,同时又有“不甚核”^③的缺点。但是,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陶传,其后各种文献递相祖述,袁传的观点成为明清两代关于徐渭晚年心态的一种流行看法。《徐文长文集》四库提要称:“盖渭本俊才,又受业于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于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这一评价即由袁宏道《徐文长传》而来,不过它进一步揭示了徐渭晚年心态转变的两个动因:1. “受业于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是其思想动因;2. “自知决不见用于时”是其现实动因。徐渭

①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最早见于万历二十八年商维藩所刻的《徐文长三集》,此本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作“皆拒不纳”,而《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作“皆距不纳”,不知何据。又:华师本《徐文长传》“如钟出土”句,《徐渭集》则作“如种出土”。

②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引文见于此本者,不再重注),第738页。

③ 袁宏道《答陶石簪》,见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第778页。

“自知绝不见用于时”是在 46 岁杀妻下狱,也即诸生学籍被褫之后。胡幕解散后,徐渭还曾一度颇有雄心地进京应李春芳幕,并为“入粟”的事情跑前跑后,自然还没有“自知绝不见用于时”,直到家难遽起、学籍被削之后,他才真的彻底绝望了。以此言之,上引四库提要的那段文字已包含了把 46 岁废籍,也就是把身份的转变,看作其心态转折点的可能。骆玉明、贺圣遂先生认为:“要彻底了解徐渭出狱以后的思想状况,必须注意到一点,即按照明代的规定,生员犯法入狱后,必须首先革去学籍。换言之,徐渭下狱七载,虽幸免一死,但他已不是秀才了。……命运在他和官僚阶层之间隔开了一道鸿沟,从此他永远只能做一个平民。因此,过去那种强烈的功名心在他身上消失了,而贫贱者与高贵者的对抗意识则更为强烈了。”^①这本质上是把社会地位的转变看作自我定位转变的前提,突显了身份认同的转变与心态转变的内在联系,可以看作对上引四库全书提要观点的一个发展,也可以看作对袁宏道以来“愤益深”说的一个诠释:就其原因而言,“愤”是因为身份的改变;就其实质而言,“愤”是一种阶级的对抗。虽然仍把其晚年心态定位在“躁动”上,但对这一心态的把握更深刻,也更具体了。“对抗”需要实力,一个脆弱的个体要真正实现对一个对立阶层的对抗其实是不可能的。徐渭晚年虽然“深恶诸富贵人”,却又不能不与他们交往,卖文卖画是他晚年主要的谋生方式,为此他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做到“显者至门,皆拒不纳”。袁宏道后来将“皆拒不纳”改成了“或拒不纳”,显然已经了解到徐渭晚年其实与地方官颇有往

^① 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4—135 页。

来,并非“皆”拒不纳。徐朔方先生从人生悲剧的高度指出了徐渭晚年既恶诸富贵人又不得不为生计而周旋其间的精神痛苦^①。袁氏在此字的改动中所表达的态度已开徐氏此论的先声,从而为徐渭散文“两期分”提供了精神层面的依据。

(二) 特色 陶望龄云:“文长负才,性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颡,咸以成其为文长而已。”^②这段话指出了徐渭散文(包括诗歌)的个性特征:其散文“成其为文长”,有其独具个人面目的特色,而参与这个特色形成的正是被正统古文辞作者视为“瑕颡”的异质元素。按陶氏的说法,这些“瑕颡”就是“性不能谨饰节目”在散文中的表现。所谓“性不能谨饰节目”除指在胡幕期间“矫饰自好”、“藉气势以酬所不快”等具体表现外,还指“性豪恣”、“大制衣被”等与一般文人斯文儒雅气派不同的任性使气的狂悖行为。章重对徐渭“志不媚世,存吾真而已”^③的评价,可以说是对“性不能谨饰节目”的另一种表达,不过陶氏从其负面而言,章氏从其正面而言罢了。当一个作家既有猛锐激越的情感需要表达,又有“志不媚世”的胆量敢于表达的时候,他的作品势必会溢出传统规范之外,而以强横刁悍的力度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对于这些方面,明人把握得已十分到位。如袁宏道称其诗文“愈粗莽,愈奇绝,非俗笔可及”^④,就指出了其与传统诗文截然

① 参见徐朔方《论徐渭》,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

② 陶望龄《徐文长传》,见《徐文长三集》,华东师范大学藏万历二十八年商维濬刻本。

③ 章重《梦遇》,见《徐渭集·附录》,第1344页。

④ 商维濬《刻徐文长原本述》,见《徐文长三集》(二十五卷本),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七年商氏修改重印本。